第44卷 第4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44, No.4
2007年7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Jul. 2007

节愍太子墓《升仙太子图》考
——兼论薛稷画鹤的时代背景

王 静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历史系，北京 100872)

摘 要：一直以传说形式流传于中原的王子晋故事，经过武则天时期的刻意经营，成为活生生的政治存在。模仿王子晋控鹤升仙在张易之兄弟为中心的政治群体中蔚然成风，也成为这个群体撰文、作画的题材。节愍太子李重俊的身世和政治命运与王子晋有着相似之处，联系其身世与改葬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特别是睿宗的作为，其墓中的仙人御鹤图像可定名为《太子升仙图》。睿宗将它安排在节愍太子的墓中蕴涵着现实的政治、宗教意义。以画鹤知名的薛稷，跟武周、及睿宗朝的政治权力中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出于画家天生的敏感，对政治氛围有清楚理解的他，凭借突出的画技，选择与当下政治有密切关系的仙鹤题材。这不仅是当下政治氛围之必需，也是他延续个人政治生命的需要。

关键词：节愍太子；王子晋；薛稷
中图分类号：K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7)04-0110-09

反复出现的绘画题材经常是时代的标志。它如何产生，如何逐渐流行并影响人们的生活，是值得探讨的课题。本文拟通过考察节愍太子李重俊墓第二天井壁画的内容，对此作初步的梳理。

节愍太子墓建于唐睿宗时期，是中宗定陵的重要陪葬墓。其主人李重俊和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章怀太子李贤均亡于唐前期宫廷政治斗争，均在中宗、睿宗之际改葬。在四墓的建制上，无论是规模、壁画内容还是随葬品都游离于等级制度之外。这与当时的政治氛围不无关系，特别是和中宗、睿宗的统治需要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它们为学界关注，可惜，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另三墓，而对节愍太子墓的关注尚不充分。

《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①]系统地披露了该墓资料，其壁画题材给人印象尤深。它们除了能反映当时宫廷绘画的某些特征之外，还是当时政治气氛与风尚的缩影。引起我们浓厚兴味的是第二天井的南北壁过洞口和东西壁的小龛两壁的壁画。由于残破严重，东壁只可辨三只仙鹤、彩云以及飘带；西壁是该天井壁画存留最多的，为仙人御鹤图，仙人丰腮丹唇，手持一物[②]，身穿橘黄色袒胸广袖襦，罩以深绿色半臂，袖口饰鸟羽状花褶。周围绘以橘黄、红、绿色的云彩，呈现一幅祥云涌动、彩带飞舞、鹤鸣空中的图像(图1)；南壁、北壁也有卷云、飘带残存。在该墓的前、后甬道券顶，也绘饰着仙鹤、凤凰、彩云[③]。

一

仙人御鹤图的出现绝非偶然。这组画不见于懿德太子等其他三座改葬墓，而惟独出现于节愍太子墓，其用意究竟何在？跟唐睿宗的政治用心，甚而当时社会的政治、宗教乃至时尚有无关联？这都是我们要重点检讨的。

经反复甄辨，我们认为节愍太子墓中的仙人御鹤图可暂称为《王子晋(又称王子乔)升仙图》。该壁画为何可如此称呼？不妨先参较王子晋与节愍太子的身世、政治生命，逐一解析。

节愍太子李重俊为中宗第三子，神龙二年(706)秋，立为皇太子，其人生悲剧也自此开始。这时，李唐王室刚刚恢复统治。在武则天时代便竭力争做太子的武三思忌恨重俊，中宗后宫、安乐

收稿日期：2006-12-28
作者简介：王 静，女，山东烟台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讲师，历史学博士。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富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② 《报告》称为“旌节状之物”。详见《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第54—59页。
③ 《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第70—74页。

公主等也对重俊嫉妒、轻视有加，他们互相勾结，共同欺压、排挤重俊，并密谋废黜。因而，重俊危机四伏，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多种矛盾的激化使他为求自保而先发制人，于神龙三年(707)七月，矫制发兵，杀武三思、武崇训于其宅第。又冲入宫内，企图搜捕韦后及安乐公主。但韦后等拥中宗登玄武门楼，中宗对重俊手下策反，导致重俊事败，逃向终南山，为左右所杀。中宗令枭其首于朝，又献之于太庙，祭武三思、崇训尸柩。[1]卷八六《节愍太子传》，2837—28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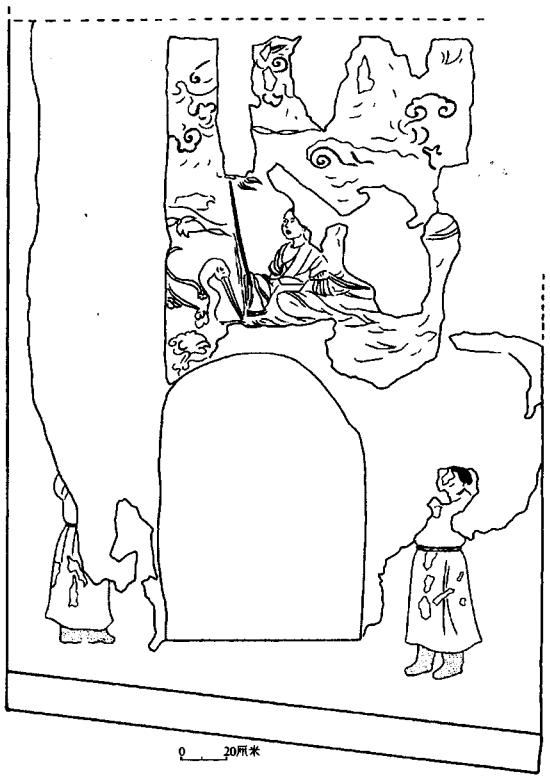

图1　节愍太子墓第二天井西壁仙人御鹤壁画

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对于节愍太子起事的性质，因当道立场不同，在睿宗时期，定性与评价便有了不同。武则天末期，政权虽归还李家，但皇储并未明确，武则天又通过婚姻等多种手段，成功地将李、武两家凝聚为一个混合集团，试图以此缓和乃至解决皇位归属的矛盾。此举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到中宗时期，皇位袭承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正是由于武三思、安乐公主等对皇位的觊觎，节愍才起身自保。其矛头本指向武三思、安乐公主、韦后，却因中宗出面而使起事性质急剧逆转，成为叛逆。时隔不久，相王李旦诛韦氏登基，是为睿宗。此时，韦后悖逆之罪已定，睿宗因武三思父子有逆乱之迹，下令暴尸平坟。这样，曾斩武三思父子、对韦氏兴师问罪的李重俊便获平反，成了为社稷舍生取义的功臣，对此，其哀册文可为明证。与重俊一样，睿宗在反韦后、武三思中上台，故登基后，必然要给重俊再作评价，借此表明自己发动政变、除掉韦后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但李、武、韦已结为利益集团，其矛盾亦属内部斗争，囿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各方都不能决裂。故此时的政治较量往往暧昧不清。《旧唐书》卷七《睿宗本纪》有一段深具意味的记载：

> 景龙四年(710)，秋七月丙辰，则天大圣皇依旧号为"天后"。追谥雍王〔李〕贤为章怀太子，庶人重俊曰节愍太子。[1]卷七《睿宗本纪》，154

这说明，睿宗进一步确立了李氏王权的正统。但当时，对节愍太子的谥号，太府少卿韦凑提出了异议，认为其行为仍属悖逆，请改谥号。虽睿宗"然其言"，而"执政以制令已行，难于改易"。[1]卷一〇一《韦凑传》，3142—3145其实，这正反映了睿宗的两难态度，他无法反对韦凑本于"三纲"的议论，但骨子里却赞成节愍的谥号和已定的结论(很可能这个结论就来自他的"制命")，故又不干涉宰臣的抵制。这可视作睿宗步步为营的试探，也多少体现了重俊起事的性质当时尚敏感。因牵涉到武则天时代的一些问题，小心翼翼的睿宗对节愍太子墓葬的处理也颇为收敛，如墓葬规格不及懿德太子、章怀太子和永泰公主①。

那么，王子晋又有怎样的经历呢？他是周灵王太子，早岁而亡。《国语》载，周灵王二十二年，穀水泛滥，与洛水相合，毁王城西南，将波及王宫，周灵王欲壅穀水而保王宫，太子晋进谏，认为此举不可行，但灵王并未采纳。[2]卷三《周语》下，101—113关于太子晋的另一件事，见于《逸周书》。书中记载，他告知师旷，自己三年后将上宾于天。[3]卷九《太子晋解第六十四》，1101—1103史载，太子晋早卒，也许是人们怀念这位温恭敦敏的储君，便传他得道升天了。关于王子晋的传说也由此而展开。

如果单就节愍太子与太子晋的事迹寻找共同之处的话，那么，可以简单归纳出两点：一、同为太子，皆早岁而卒；二、因为韦后、武三思乱政，节愍

① 《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第六章《结语》二《关于节愍太子墓的规模与配置》，第164—169页。

太子领兵犯阙,太子晋则曾作犯颜之谏。仅凭这两点,尚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亦即无法将节愍太子墓中的《仙人御鹤图》与王子晋升仙联系起来。但它们却为进一步判断奠定了基础。

关于王子晋典型的传说为《列仙传》中的记载:

>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亦立祠于缑氏山下及嵩高首焉。[4]卷上《王子乔》条,65

此传说是经过历史的积累,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而最终形成的①。在流传过程中,王子晋升仙逐渐具有了几个固定的特征:一、王子晋好吹笙作凤凰鸣,后世逐渐衍生出箫②;二、骑鹤升天;三、升天在七月七日。

时人描写王子晋,说他"俯接浮丘公,行吹洞箫,坐弄云凤"[5]卷六《冥寞君古坟志铭:为张昌宁作》,68上栏。节愍太子墓壁画则有彩云环绕,仙人持箫御鹤,墓室甬道券顶还饰有凤凰、彩云、仙鹤。这与传说中王子晋在嵩山头驾鹤升天的情景吻合。至于以王子晋比附李重俊,则可参照《节愍太子谥册文》。其文曰:

> 维景云元年岁次庚戌十月戊寅朔二十九日丙申。皇帝若曰:"咨尔故皇太子重俊,业隆继体,才膺守器。神机辨日,高视晋储;精议防年,遐吞汉两。抚军监国,皇基攸固;齿胄问安,圣图惟永。顷以谗邪浸润,恩礼疏薄,外迫伊戾之谋,中启骊姬之谮。彼则凶计斯甚,摇动元良;尔乃诚心密运,扫除悖德。兴晋阳之甲,以罪荀寅;拥汉阙之兵,而诛赵虏。呜呼,逆首虽殄,余党(凶党)未清,属投杼生疑,乱兵旋及。朕代天理物,推亡固存,近剿四凶,缅怀三善,言征备礼,以慰冥魂,银榜山门,画堂泉室。三年遂远,上宾之驭不留;千载犹生,全节之名长在。(夫)存著徽烈,(则)殁有余裕,志业若此,痛悼良深,宜加宠号,用旌不朽,今册谥尔曰:"节愍(皇)太子"。魂而有灵,嘉兹茂典,呜呼哀哉。[6]298③

册文为沈佺期撰,多用典故,在赞誉节愍太子的同时,也隐含了武则天朝的政治。"兴晋阳之甲,以罪荀寅;拥汉阙之兵,而诛赵虏",则用吕后立刘氏为王,而不立吕氏为喻,表明节愍太子是为李家王朝而奋争。《逸周书·太子晋》有:"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之语,亦被用于册文,即所谓"三年虽远,上宾之驭不留"。王子晋被武后封为升仙太子,"上宾"一词,亦见圣历时的《升仙太子碑》。册文虽为沈佺期所撰,但却是以睿宗的口气,既代睿宗作,必经睿宗首肯,甚至出自睿宗指授。册文其实是将节愍起事定位为复辟李家王朝,加以肯定和褒奖的。对于节愍早亡,睿宗则视同王子晋的升仙。但此处,我们尚不能遽然确定节愍太子与王子晋之间联系是唯一而绝对的,因为在另两篇文章里,沈佺期也用到王子晋的典故。作于景云二年(711)十月的《故章怀太子良娣张氏册文》称,"恩绝宾帝,七日无归"[6]上册《沈佺期集校注》卷五,306;而在《章怀太子靖妃挽词》中,则有"形将鸾镜隐,魂伴凤笙游"之句[6]上册《沈佺期集校注》卷三,182—183④。值得注意的是,沈佺期正是为张易之撰《三教珠英》的成员之一,对与张昌宗有关的王子晋升仙故事必极熟悉。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典故反复用在与政治斗争有关的皇室成员身上,不可忽视。

除挺身为国外,李重俊与王子晋故事的相似处还有死期。节愍起事为七月五日,其身亡日起码与王子晋成升仙的七月七日相近,时间的巧合也是借题发挥的一个由头。或许这也是睿宗等惟独在节愍太子墓中大肆渲染王子晋升仙氛围的重要因素吧。

将节愍太子与王子晋作比是那个时代的共识。开元时,张说撰《节愍太子妃杨氏墓志》,言及节愍太子之死,仍道:"岂止言违斗水,神往邙山,七日之望不归,千秋之言何及?"[7]卷九六四,5071上栏依然在用王子晋典说节愍太子事,即将节愍起事比作王子晋谏壅穀水和洛水,将节愍之死比作是王子晋七月七日升天。这可进一步判定将节愍太子比拟为王子晋深具含义。张说墓志赞美节愍太子妃

① 櫻井龙彦《王子乔·赤松子传说の研究(2)》,《龙谷纪要》6卷2号,1984年,第148—177页;櫻井龙彦《王子乔·赤松子传说の研究(3)》,《龙谷纪要》7卷1号,1985年,第196—220页。

② 铜镜中的王子晋升仙图,多和吹笙,但在武则天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却经常"箫"、"笙"兼用。

③ "余党",节愍太子墓所出《谥册文》作"凶党";"夫"、"则"、"皇"三字据节愍太子墓所出《谥册文》补。详见《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第145、147—149页。

④ 此外,沈佺期尚有《凤笙曲》,见《沈佺期集校注》卷三,第41页。

说："何必鼓吹，山上遥传慈母之名，石阙庙中独立少姨之像。"[7]卷九六四，5071下栏 万岁登封元年(696)，武则天封禅嵩山后，"以封禅日为嵩岳神祇所佑，遂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皇帝，灵妃为天中皇后，夏后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神为玉京太后，少室阿姨神为金阙夫人；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别为立庙"[1]卷二三《礼仪志》三，891。由此可知，在时人，特别是统治集团心目中，节愍太子夫妇都跟嵩山上的神灵有联系。

基于上述缘由，我们认定节愍太子墓中的仙人御鹤图像表现的是王子晋升仙故事。鉴于武后封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因此定名为《太子升仙图》可能更适宜。联系墓主人身世与改葬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特别是睿宗的作为，《太子升仙图》出现在节愍太子墓蕴涵着深刻的政治、宗教意义。

二

上文比附两个相隔千年的人物，也许要遭受牵强附会的责备。但实际上，王子晋一直以传说形式流传于中原，经过武则天时期的刻意经营，更成为活生生的政治存在，从而使节愍太子墓葬壁画有了现实的意义。这又正是我们要进一步讨论的。

《太子升仙图》蕴涵的政治、宗教意义，需从武则天期间的一系列措施谈起。王子晋得到武后的青睐，被封为"升仙太子"，并重修其缑山上庙宇，且几度亲临。

武则天笃信佛教，但在政治中，又利用道教①。史载，武则天曾频繁驾临嵩山。万岁登封元年，她封禅嵩山，并册封嵩岳神祇，于是，王子晋也成了升仙太子，事见《旧唐书·礼仪志》：

> 则天证圣元年(695)，将有事于嵩山，先遣使致祭以祈福助，下制，号嵩山为神岳，尊嵩山神为天中王，夫人为灵妃。嵩山旧有夏启及启母、少室阿姨神庙，咸令预祈祭。至天册万岁元年腊月甲申，亲行登封之礼。礼毕，便大赦，改元万岁登封，改嵩阳县为登封县，阳城县为告成县。粤三日丁亥，禅于少室山。又二日己丑，御朝觐坛朝群臣，咸如乾封之仪。则天以封禅日为嵩岳神祇所佑，遂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皇帝，灵妃为天中皇后，夏后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神为玉京太后，少室阿姨神为金阙夫人；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别为立庙。[1]卷二三《礼仪志》三，891

此后，武氏又几次临幸王子晋庙，《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

> 〔圣历二年二月〕戊子(699年3月9日)，幸嵩山，过王子晋庙。丙申，幸缑山。[1]128

并在该年立《升仙太子碑》，还手书碑文②。学者多认为这是在攀附神仙、神化家世。公元700年7月27日，武则天派胡昭在嵩山峻极峰投金简一通，文曰："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③ 看似对神灵谦恭有加，但"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却多少道出了对政治生涯的诸多反思和忏悔。对李唐诸多太子、公主的逐一排挤、剪除可能便是她忏悔的主要原因。在继承人选尚处两可之际，树立《升仙太子碑》不仅能稍稍平息内心的不宁，也能安抚李唐宗室及其势力，改善同李氏的关系，调和李氏和武氏的矛盾。无论如何，这对大周的未来都有百利而无一弊。更何况，此举还可能获取支持李家的道家信徒的认同、拉近与道教的关系。一举多得，机谋可谓深矣！中宗、睿宗时期的政局也证明《升仙太子碑》是协调李氏、武氏关系的润滑剂。于是，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沈佺期在为章怀太子靖妃、良娣张氏撰写的册文中，也将李贤比喻为王子晋了。只是正如前文所述，在因武氏而亡的诸多李唐太子中，节愍太子的事迹最为典型，与王子晋也最具可比性。况且，到睿宗时期，那些太子亦多已妥当重葬。这一切都让节愍太子成为王子晋的惟一指代有了可能，并终成为睿宗朝的共识且影响至远。

政治行为的目的与影响从来罕见单一，《升仙太子碑》正是一座这样的政治性建筑。无疑，它还表达了晚年武则天长生不老、欲图成仙的愿望，她命受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自己炼丹便是

① 汤用彤《从〈一切道经〉谈到武则天》，《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349—35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饶宗颐《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3分册，1974年，第397—413页；后载所撰《选堂集林·史林》(中)第587—613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年版。

② 《升仙太子碑并序》，见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第89—90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③ 《中岳投金简文》，见《道家金石略》，第93页。

明证。王子晋成仙传说有着美好的寓意,对希求长生者而言,尤其令人向往,故王子晋驾鹤升天的象征意义也往往为人所用。驾鹤升天是王子晋得道成仙的标志,武后便曾一度以"控鹤"为名,专设"控鹤府",以张氏兄弟为控鹤监。《旧唐书》卷七八记载:

> 圣历二年(699),置控鹤府官员,以易之为控鹤监内供奉,余官如故。久视元年,改控鹤府为奉宸府,又以易之为奉宸令,引辞人阎朝隐、薛稷、员半千并为奉宸供奉。[1]2706①

改奉宸府之前,则天还一度以控鹤监为天骥府[8]卷七六,3484。此或缘于鹤为仙人骐骥。这样的机构自然要网络一批文人官员。《旧唐书》卷一八六上《吉顼传》云:

> 圣历二年腊月,〔吉顼〕迁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时易之、昌宗讽则天置控鹤监官员,则天以易之为控鹤监。顼素与易之兄弟亲善,遂引顼,殿中少监田归道、凤阁舍人薛稷、正谏大夫员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俱为控鹤内供奉。时议甚不悦。[1]4849

可见这个机构不乏人物,薛稷等便在其中。写在《升仙太子碑》碑阴题记中的大臣多为宰辅,还有左控鹤内供奉和右控鹤内供奉,其中的左控鹤内供奉便为吉顼。此外,尚有武三思、薛曜、薛稷,这三人同本文的讨论关系密切。但是,控鹤府的设置与规制不符,加之张昌宗在宫中多嬉戏游乐,招致朝臣不满。于是,武则天为了消弭非议,就令张昌宗引领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等二十六人撰《三教珠英》,以掩饰美化他们的行为[1]卷七八《张行成传》附张易之,2707。据《唐会要》卷三六记载:

> 大足元年(701)十一月十一日,麟台监张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
>
> 初圣历中,上以《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备,遂令张昌宗召李峤、阎朝隐、徐彦伯、薛曜、李尚隐、魏知古、于季子、王无竞、沈佺期、王适、徐坚、尹元凯、张说、马吉甫、元希声、李处正、高备、刘知几、房元阳、宋之问、崔湜、常元旦、杨齐哲、富嘉谟、蒋凤等二十六人同撰。[9]766—767

这些人或暗中代张易之撰写文章,譬如阎朝隐、宋之问;或所撰多涉及王子晋典故,诸如沈佺期、张说②。这样,在张氏兄弟周围又形成一个群体。

张氏兄弟恩宠甚深,甚至相王、太平公主都对他们礼让三分。故献媚攀附者颇多,还进而附会张昌宗为王子晋后身。《旧唐书》卷七八《张昌宗传》载:

> 每因宴集,则令嘲戏公卿以为笑乐。若内殿曲宴,则二张、诸武侍坐,樗蒱笑谑,赐与无算。时谀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晋后身。乃令被羽衣,吹箫,乘木鹤,奏乐于庭,如子晋乘空。辞人皆赋诗以美之,崔融为其绝唱,其句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1]2706

张昌宗身着羽衣、吹箫、乘木鹤,恰是王子晋成仙的典型场景,又与上述节愍太子墓壁画场景何其相似。而控鹤府之"控鹤"一词的由来也与此传说有关。众人之所以佞称张昌宗为王子晋,不仅因张昌宗、张易之工合炼,谙养生,还与武则天册封王子晋为"升仙太子"有莫大关系。至于张氏兄弟,亦乐于以王子晋后身自喻。

武三思曾极力营求太子之位,因张氏兄弟得宠,有进言之便,故倾力献媚,不但侍奉周到,而且投其所好。这样以武三思为首的一干人便借此大作文章,将张昌宗比附为王子晋。《朝野佥载》卷五:

> 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缑氏山立庙,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10]125

《和梁王众传张光禄是王子晋后身》便为崔融所撰。诗云:

> 闻有冲天客,披云下帝畿。三年上宾去,千载忽来归。昔偶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柱史姓名非。祇召趋龙阙,承恩拜虎闱。丹成金鼎献,酒至玉杯挥。天仗分旌节,朝容间羽衣。旧坛何处所,新庙坐光辉。汉主存仙要,淮南爱道机。朝朝缑氏

① 又《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传》(第128页)云:"圣历二年(699)春二月,封皇嗣旦为相王。初为宠臣张易之及其弟昌宗置控鹤府官员,寻改为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

② 张说《寄天台司马道士》中有"何时枉飞鹤,笙吹接人间"。《全唐诗》卷八七,第3册,第955页。

鹤，长向洛城飞。[11]卷六八，第3册，767

鹤一起千里，古谓之仙禽。从上文可知，王子晋升仙时便是驾鹤。甚而世人还附会出，接引王子晋上嵩山的浮丘公便撰有《相鹤经》，并传于子晋①。所以，一定意义上，鹤就等同于王子晋，具有祥瑞、长生、仙人的象征意义。武三思还特地撰《仙鹤篇》，诗云：

白鹤乘空何处飞？青田紫盖本相依。缑山七月虽长去，辽水千年会忆归。缑山杳杳翔寥廓，辽水累累叹城郭。经随羽客步丹丘，曾逐仙人游碧落。迢迢碧落断氛埃，霞堂云阁几重开。欲寻东海黄金灶，仍向西山白玉台。九皋独唳方清切，五里惊群俄断绝。月下分行似度云，风前扬影疑回雪。风前月下路漫漫，水宿云翔去几般。宛转能倾吴国市，裴回巧拂汉皇坛。琴中作曲从来易，鼓里传声有甚难。夜夜恒飞银汉曲，朝朝常饮玉池澜。别有闻箫出紫烟，还如化履上青天。霜毛忽控三神下，玉羽俄看二客旋。燕雀终迷横海志，蜉蝣岂识在阴年。莫言一举轻千里，为与三山送九仙。[11]卷八〇，第3册，865—866

于是，鹤、王子晋就成为这个群体赋诗、撰文、作画的题材。在当时统治集团中，最起码是张氏兄弟为中心的政治群体中颇有蔚然成风之态势。

三

以上讨论了武则天集团对王子晋故事的热衷和它如何演为风尚，然而，又是何人令王子晋故事进入节愍太子墓葬壁画呢？我们认为，睿宗是关键人物。

封禅嵩山时，武后曾撰《升中述志碑》，碑文为睿宗所书，碑阴为钟绍京所书，立于嵩山之巅②。这证明武则天的此次嵩山行，睿宗也参与其中。不仅如此，睿宗与《升仙太子碑》也渊源颇深。碑阴题记表明，武则天死后的神龙二年，当时身为相王的睿宗，曾奉制刊碑。碑文上铭刻了当时相王府官员：

神龙二年岁次景午水捌月壬申金朔贰拾柒日戊戌木开府仪同三司左千牛卫大将军上柱国安国相王旦奉制刊碑刻石为记/

从官特进行尚书左仆射兼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平章军国重事上柱国芮国公豆卢钦望/

从官太中大夫行安国相王府司马护军皇甫忠/

朝散大夫守安国相王府咨议上柱国邢国公 温/

朝议大夫行安国相王府记室参军事丘悦/

朝议郎行安国相王府文学韦利器/

朝议大夫行安国相王府仓曹参军事辛道瑜/

行安国相王府属韦慎惑/

行安国相王府掾丘知几/

行安国相王府典军丘琬/

行安国相王府典军卫日新/

从安国相王品官行内侍省奚官局令引参目/

安国相王品官行内侍省掖庭局令载思恭/③

相王刊碑刻石乃奉中宗之命。为何奉制刊碑刻石？史无明载。如前述，为避免身后武氏、李氏互相杀戮，武则天晚年以婚姻等途径将两集团结合为一体，是谓“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神龙元年，张氏兄弟被诛、中宗即位不久，武三思依靠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武氏势力再振。[12]卷二〇八，中宗神龙元年，6586—6588神龙二年，诛张氏兄弟的“五王”也逐渐被疏忌，并被武三思陷害致死。[12]卷二〇八，中宗神龙二年，6606神龙年间，中宗对武氏依然崇重，而《升仙太子碑》与道教关系甚密，也符合李氏的政治利益。故此时，命相王旦刊碑刻石，应意在重新调整李、武两家的关系。而这次刊碑也让相王深刻理解了《升仙太子碑》的政治功用。

则天朝至睿宗朝，对佛道两教的态度被视为李唐王室与武周政治斗争的环节之一。但武则天晚年，借婚姻将李、武凝聚为一混合体。通过政变登基未久的睿宗，即便要崇敬李唐建国伊始便大

① 《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下》（第2035页上栏）载：“《相鹤经》一卷，浮丘公撰”。《郡斋读书志》卷一五云：“《相鹤经》一卷。右题曰浮丘公撰。其传云：‘浮丘公授于王子晋。后崔文子学道于子晋，得其文，藏于嵩山之石室。淮南公采药得之，乃传于世。’”〔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第6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宋代政和中，因河南尹请求，将碑打碎。《金石录》卷二五《周武后〈升中述志碑〉》条，〔宋〕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第45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升仙太子碑并序》，见《道家金石略》，第89—90页。

力弘扬的道教,也不便大张旗鼓同母亲作对,故要寻觅一温和手段,则天后期所立《升仙太子碑》便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睿宗遂由此入手,寻求两者契合之处,弥合了两者的对立。实际上,晚年的武后,除为追求长生不老而信仰道教,必也通过道教凝聚与李唐宗室的关系。

武则天时期,王子晋传说曾与张氏兄弟联系紧密,对此,睿宗必然十分清楚。《唐会要》卷五一记载:

> 〔圣历〕三年腊月,张易之兄弟贵宠踰分,惧不自全,请计于天官侍郎吉顼。顼曰:"公兄弟承恩深矣,非有大功于天下,自古罕有全者。唯有一策,苟能行之,岂止全家,亦当事茅土之封耳。除此之外,非顼所谋。"易之兄弟涕泣请之。顼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已高,武氏诸王殊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请立庐陵、相王,以副生民之望。"易之乃乘间屡言之,则天意乃易。既知顼之谋,乃诏问顼。顼曰:"庐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托于陛下,当有所主。"上意乃追中宗焉。其事密,睿宗立,左右乃发明之。遂追赠顼为御史大夫,制词云:"王命中否,人谋未辑,首陈返政(反正)之议,克副祈天之基。"[9]卷五一《识量上》,1043

这说明,睿宗即位后,感谢吉顼在李唐王室的复辟的功绩。事实上,这只是吉顼为张氏兄弟谋,若非二张进言武则天,此事未必能够实现。对李氏王朝复辟,张氏兄弟出力甚多①。史籍虽未言睿宗对张氏兄弟的态度,但睿宗对他们此举心存感激当在情理之中。

对道教,睿宗十分虔诚。武则天曾召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到洛阳;景云二年(711),睿宗亦曾召他入宫。[1]卷一九二《司马承祯传》,5127—5128 如果从宗教的渊源分析,天台山、司马承祯与王子晋尚有关联。这又为我们探索王子晋的传说与唐王朝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据唐代崔尚《天台山桐柏观碑》记载,天台山洞天金庭宫即右弼王子晋所居之处。景云年间,睿宗还曾颁命,新作桐柏观,以弘扬道教,维护李唐基业②。司马承祯也曾作《上清侍帝晨桐柏真人真图赞并序》,根据他的序言,其中图画了国史与道书所记王子晋升仙前后的各种故事场景,其中也包括他七月七日控鹤升天。[13]卷九二四,9634下栏—9637上栏

这样,"升仙太子"王子晋的传说与武则天、中宗、睿宗时期的政治紧密结合,既承载着睿宗竭力恢复李唐王室权威的努力,又富有社会、政治、宗教的背景。至于节愍太子,则具备将这个故事延伸的条件,因此,睿宗便将它绘于节愍太子墓。

四

考察节愍太子墓中的《太子升仙图》以及云鹤题材,则不能不谈同一时代以画鹤著称的薛稷。当时,绘制这种题材的风气渐起。作为著名画家,薛稷画鹤颇受推崇。《历代名画记》卷九记载:

> 〔薛稷〕多才藻,工书画。……尤善花鸟、人物、杂画。画鹤知名,屏风六扇鹤样,自稷始也。[14]111

若加考察,可以推断除了前文所论则天朝以来之政治形势之外,鹤的题材同薛稷的仕途经历及其交游不无关系。这些共同构成薛稷画鹤的时代背景。

武则天当政时期,薛稷曾参加《升仙太子碑》的创制,圣历二年(699)的碑阴题记便为薛稷与其从兄薛曜所书。陈子昂所撰《冥寞君古坟志铭:为张昌宁作》文的铭辞便为薛稷所作,而该《古坟志》记述了武则天登少室山觅得王子晋的遗墟,欲开室修建,而见一不知姓氏、年代远近的古坟,故记之。因此,它与王子晋的传说也有密切的关系。这均说明薛稷与《升仙太子碑》以及王子晋的传说有着很深的渊源。

薛稷也曾为控鹤监的成员,曾依附张氏兄弟,并参与游宴,必曾目睹张昌宗控木鹤扮王子晋宾天。文人们在用诗歌来唱和张昌宗为王子晋后身、诵赞升仙工具的鹤时,擅长画艺的薛稷以鹤作为绘画的题材,为这一场景锦上添花,也顺理成章。于是,薛稷所画之鹤,也就适时出现在公私场合中,并形成了自家风格。《封氏闻见记》卷五云:

> 则天朝,薛稷亦善画,今尚书省侧考功员外郎厅

①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82—285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② 《天台山桐柏观碑》,见《道家金石略》,第133—134页。

> 有稷画鹤，宋之问为赞①；工部尚书厅有稷画树石，东京尚书(善)岐王宅亦有稷画鹤，皆称精绝。[15]43

引文中的尚善坊岐王宅本为武三思私第，薛稷曾为画鹤，后宅归岐王所有[16]148。至此，薛稷画鹤之社会背景昭然。

薛稷与睿宗也有良好的关系。据两《唐书》薛稷传记载，睿宗在藩邸时，薛稷便被招引。睿宗践祚，薛稷拜中书侍郎，掌制诰，参知政事。他常被召入宫中，参决庶政，宠极一时。《旧唐书》卷七三《薛收传》：

> 睿宗在藩，留意于小学，〔薛〕稷于是特见招引。俄又令其子伯阳尚仙源公主。及践祚，累拜中书侍郎，与苏颋等对掌制诰，俄与中书侍郎崔日用参知政事。睿宗以钟绍京为中书令，稷劝令礼让，因入言于帝曰："绍京素无才望，出自胥吏，虽有功勋，未闻令德。一朝超居元宰，师长百僚，臣恐清浊同贯，失于圣朝具瞻之美。"帝然其言，因绍京表让，遂转为户部尚书。稷又于帝前面折崔日用，递相短长，由是罢知政事，迁左散骑常侍，历工部、礼部二尚书。以翊赞睿宗功封晋国公，赐实封三百户，除太子少保。睿宗常召稷入宫参决庶政，恩遇莫与为比。[1]卷七三《薛收传》附稷传，2591

薛稷先后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为官，跟武周、及睿宗朝的政治权力中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出于画家天生的敏感，对政治氛围有清楚理解的他，凭借突出的画技，选择与当下政治有密切关系的仙鹤题材也就顺理成章。这不仅是当下政治氛围之必需，也是他换取延续个人政治生命的需要。

以当时的境遇，薛稷可能参与了睿宗为节愍平反建墓的过程。睿宗与薛稷均曾参加《升仙太子碑》的创制，薛稷又尤以画鹤见长，这样节愍太子墓中出现《升仙太子图》便属自然。睿宗和薛稷对王子晋升仙的故事如此熟悉，自然能体味出王子晋与节愍太子的诸多一致。薛稷擅长的这个题材虽最早由武则天提倡，但却又不怎么敏感。薛稷所画之鹤，目前已无真迹存世。曾有许多人描绘过薛稷画鹤有"啄食"、"顾步"、"瞰天"、"舞风"、"警露"、"理毛"六种不同的姿态。另外，我们考察节愍太子所有的壁画题材，还有人物、花鸟等等，如前引《历代名画记》卷九所言，亦均为薛稷所擅长。综合视之，节愍太子墓室壁画采自薛稷的粉本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

宾天控鹤，鹤是得道成仙的主要交通工具。画鹤于墓室，寓意自然是得道成仙。考古材料表明，云鹤入画始盛于七八世纪之际的武则天晚期和中、睿宗之世，主要出现在皇室和贵戚的墓葬中。除节愍太子墓外，还见于神龙二年(706)的永泰公主墓、景龙二年(708)的韦泂墓。这个现象应和上文讨论的政治背景有莫大关系。在此背景下，薛稷画鹤成为一时标准和时代风尚，并对后世影响颇深。鹤入屏风，成为厅堂装饰，也自薛稷始②，到更晚的时代，令薛稷享誉的六扇云鹤屏风画还反复出现于墓葬，如会昌四年(844)的梁元翰墓、咸通五年(864)的杨玄略墓等③，它们则应是对人间生活的再现。从天宝以后到唐末，西安地区也开始流行折式屏风画，突出云、鹤的题材④。这反映了云鹤题材向社会中下阶层的普及。它的出现除了上行下效外，还应和下面两个原因有关。其一，在薛稷将文人歌咏的鹤引入绘画后，他的作品又转而成为李白、杜甫等文人骚客吟咏的对象。其二，由于安史之乱的冲击，画鹤引发对现实中的鹤的喜爱，从而影响到士大夫的生活。自9世纪后期开始，士大夫养鹤也渐成风气。绘画中的云鹤题材也越发得到推崇。

唐代的云鹤入画展示了画题转为社会风尚的一个类型：它肇始于统治集团的政治行为，并对集团中某个群体的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对此，文人

① 宋之问尚有《咏省壁画鹤》诗："粉壁图仙鹤，昂藏真气多。翥飞竟不去，当是恋恩波。"《全唐诗》卷五三，第2册，第658页。

② 小川裕充《黄筌六鹤图壁画とその系谱(上)》，《國華》1165，1992年版，第7—22页；《薛稷六鹤囡屏风考——正倉院南倉宝物漆櫃に描かれた草木鹤囡につい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17册，1992年，第179—214页。

③ 转引自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第148页。有关研究可参张建林《唐墓壁画中的屏风画》，原载《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此据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研究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227—239页。

④ 齐东方《隋唐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骚客的反复歌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社会局势的变化又提供了滋长的土壤,使之渗入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之中。

参考文献:

[1] 刘昫,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国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 李学勤审定. 逸周书汇校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 王叔岷. 列仙传校笺[M].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5.

[5] 陈子昂. 陈拾遗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 陶敏,易淑琼. 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7] 李昉,等编. 文苑英华[M]. 北京:中华书局,1966.

[8]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9] 王溥. 唐会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0] 张鷟. 赵守俨点校. 朝野佥载[M]//. 隋唐嘉话·朝野佥载. 北京:中华书局,1979.

[11]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12] 司马光,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13] 董诰,等编.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 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15] 赵贞信. 封氏闻见记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16] 徐松撰. 张穆校补. 方严点校 . 唐两京城坊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Research on Shengxian Taizi Tu in Jiemin Taizi Tomb

WANG Jing

(*School of History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mural in tomb of the Jiemin Taizi(prince), Li Chongjun 李重俊, which describes an immortal who looks nice, riding on a carne with something in hand. Basing on reviewing the political career of Jiemin Taizi(prince), the politic and society during Wu Zetian 武则天, Emperor Tang Zhongzong 唐中宗 and Tang Ruizong 唐睿宗 era, this article discovers this painting implies realistic meaning of politic and religion. Furthermore, this mural has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legend of Wang Zijin 王子晋 and Tai Zi Shenxian Bei 太子升仙碑 built by Wu Zetian. Therefore, the author calls this mural Taizi Shenxiantu 太子升仙图. It was Tang Ruizong who ordered to draw the painting. In the light of that, this article anatomizes why Xue Ji 薛稷 chose the carne as his theme on the basic of discussing further the politic atmosphere in this period and the social relation with others of Xue Ji.

Key words: Jiemin Taizi; Wang Zijin; Xue Ji

(责任编辑 郑 园)